

受中国文化的间接影响,南北朝时期,倭五王虽然坚持向南朝派遣使者,但远水不解近渴,区区几次遣使对倭国的需求而言,只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从这层意思上讲,倭国派出遣隋使之举,在东亚地域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倭国摆脱了朝鲜半岛的中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和摄取中国文化,在迈向国际化的同时,为提升本民族的文化创造了机缘;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直接航路的开通,加快了物资和信息流通的速度,使倭国摄取中国文化的质和量发

生巨大变化。

倭国根据前一次遣使的归国述职报告,不断调整下次遣使的人员结构、出使目的、携带物品等,到了遣唐使时期,以建构律令制国家为目的派出使团,逐渐成为固定的国策。因而,从唐朝获得绚丽的实用物资并非倭国的首要目标,遣唐使团中的各色人等致力于收集中国的书籍以及唐朝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信息,均是围绕构建本国的律令制而展开的。

## 东亚关系的变动与遣唐使始末

韩 昇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 历史系,上海 200433)

### 一、唐初的日本使节

公元618年,唐在长安宣告成立。唐高祖忙于平定各地的武装势力,无暇顾及东亚事务。唐太宗即位之后,国内业已统一。629年,李靖讨伐突厥,翌年灭其国且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唐朝最大的外部威胁。此后,唐朝又开始致力于构建国际关系体系,积极招抚四方。

就在此时,日本使者来到唐朝。贞观四年(630)犬上三田耜和药师惠日率领日本第一次遣唐使团来访。犬上三田耜就是最后一次遣隋使节犬上御田锹,而另一位大使药师惠日曾是第一批到隋朝的留学生。显然,日本精心派遣熟悉中国的人到唐朝,了解新王国的情况。看来,日本颇急于同唐朝建立关系。

首先,同中国建立稳固的关系,是圣德太子以来确定的方针,隋朝的迅速灭亡打断了这一进程,现在唐朝继起,尝试延续既定的交往路线是很自然的。

其次,隋文帝晚年开始,到隋炀帝征伐高句丽,隋朝重建东亚国家间关系秩序的政策是一贯的,现在唐太宗又开始推行积极的对外政策,与高句丽的关系如何演变,对于在朝鲜半岛南部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日本,不能不深怀关心,有必要实际了解。这从前三批遣唐使的人选可以见其一斑。第一次遣唐大使既如上述,第二次遣唐大使为吉士长丹和吉士驹,吉士是大陆迁徙到日本的移民家族,祖上代代担任对外交往官职,是日本的职业外交家。永徽五年(654)派遣的第三次遣唐使,由高向玄理、河边麻吕和药师惠日率领,高向玄理因为大化革新的功绩,在日本受到尊重,地位亦高,而药师惠日是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已经是第二次出任遣唐使节了。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这一年日本内则孝德天皇死去,外则高句丽联合靺鞨对依附唐朝的契丹发动进攻,东北亚局势一触即发。正因为形势严重,所以日本才会派出年事已高的高向玄理到唐朝来,结果高向玄理不堪旅途劳顿,死在唐朝。

此外还有别的理由吗?《日本书纪》“推古三十一年(623)七月”条记载,留学生僧广(惠)济、惠光、惠日和福

因等人从新罗回日本,共同向朝廷上奏道:“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这篇奏文有两个意思,一是留学生学业已成,应该召唤他们回来为国服务。二是唐朝是法制完备的国家,应该经常派遣使者,保持关系畅通。

这实际上道出了日本急于派出遣唐使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日本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了,必须通过向唐朝学习以继续推进。自大化革新以来,日本社会在不断向上提升,变化颇大,班田制全面推行,中央官制也在不断改革,佛教已经冲破旧贵族的反对而蓬勃发展,日本的自豪感在加强,大约在唐武则天时代,日本改用新的国名,称作“日本”。日本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向大陆吸取先进经验作指导。

综上所述,唐朝初期的遣唐使,对于日本而言,仍然围绕着打探唐朝虚实、朝鲜半岛局势和学习唐朝先进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展开,双方关系的定位仍未解决,这与遣隋使的情况大同小异。因此,这时期的遣唐使应该置于遣隋使的延长线上。

### 二、遣唐使分期及变化特征

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组织派遣的,而不是一般的民间来往。据此,把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批次时间略示如下:

(1) 630年	(2) 653年	(3) 654年	(4) 659年	(5) 665年	(6) 669年
(7) 701年	(8) 717年	(9) 733年	(10) 752年	(11) 759年	(12) 761年 未成行
(13) 762年 未成行	(14) 777年	(15) 779年	(16) 804年	(17) 838年	(18) 894年 未成行

日本宽平六年(894唐乾元元年)根据遣唐大使菅原道真建议,从此废止遣唐使。实际上,唐乾封二年(667),日本朝廷还派遣了一次使团,送唐朝使者司马法聪回去,这次使团其实是在收拾日本与唐朝军队“白江口之战”后的残局,双方国家关系仍未恢复正常,而且只送到百济为止,兹不列入。

除此之外,在唐朝的记载中,还有多次日本使节的

到访,足见唐朝与日本的使节往返相当频繁,双方关系密切。但是,唐朝方面仅留下“日本国遣使来朝”之类简单的记载,而日本方面未将他们列入遣唐使之中。由此看来,遣唐使属于日本朝廷专门组织的大规模官方使团,有别于一般的使节来往,故不可将遣唐使视为唐朝与日本交往的全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669年到701年之间,32年间日本没有向唐朝派遣使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唐朝重建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在东亚遭到高句丽的抵抗,从唐太宗以来,常有战事。唐高宗时代,朝鲜南部的局势更加恶化,百济和新罗原来共同抵抗高句丽南下扩张,后来为了领土问题打了起来,百济遂倒向高句丽,而新罗也采取对抗措施,向唐朝称臣,引为后援。唐高宗一再调停百济和新罗的纷争,但百济不听,攻势更猛,逐渐站到唐朝的对立面上。唐朝从辽东征伐高句丽,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又要救援新罗,干脆开辟南方战线,派水师从山东半岛渡海进攻百济,一举灭掉百济,和新罗会师,从南面威胁高句丽。日本视朝鲜南部为其通往大陆的生命线,所以积极介入朝鲜事务,以救援百济为名,大规模出兵新罗,转战北上。663年,双方在白江口爆发决战,唐朝水师彻底击垮日军。消息传回,日本举国震动,连忙在九州构筑山城,深沟高垒,层层布防。所以,第4、5、6次遣唐使都是围绕朝鲜战事展开的。据此,我们可以把遣唐使分为两期,从630年至701年为前期,而以701年至894年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为止,作为后期。

前期可以放在遣隋使的延长线上,随着朝鲜局势的紧张,日本与唐朝关系的定位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企图和隋唐帝国分庭抗礼,直至双方兵戎相见,日本惨败,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切身体会到与唐朝制度文化上的差距仍大,加上唐朝妥善进行善后处理,毫无进攻日本的意图,取得日本的信任,所以,从701年开始,日本又重新派出遣唐使,揭开了后期遣唐使的序幕。

后期遣唐使的目的和任务就清楚而单纯得多了,

放下与唐朝争长短的欲望,中心任务就是保持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广泛收集各类图籍,拜师交友,学习知识,一批一批地运回日本,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大起唐式伽蓝,尤其以位于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为代表,八九世纪的日本简直就是唐朝的缩影。

全面唐化的奈良时代,日本文化史称之为“唐风文化”时期。其实,日本吸取中国文化的历史十分悠远,长期的文化薰染,极大地提高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素养,汉字弥补了日本没有文字的缺陷,使得思想文化得以代代传承,儒家伦理塑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的认真细致,把中国学习学得那么惟妙惟肖,移植得那么完好,整个贵族社会弥漫着以唐为荣的气氛,从唐朝学来的东西在日本再现,乃至今日中国踪迹难觅的唐物,却在日本旧都漫步时随处可见,经过千年岁月洗刷,更加魅力四射,大气有力而底蕴深厚。

然而,汉字也好,唐诗也罢,毕竟都是外来的,日本人写的虽然是汉字,读的却是日本的音,创作起来很不方便,尤其是做韵文就更难了。于是,日本人取汉字的偏旁,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局部,做成“五十音图”,制造出新的表音符号,从此日本人可以不受拘束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汉诗也渐渐变成了和歌,日本慢慢走上了自己的文化之路。而在此时,唐朝文明熟透了,社会也在安逸享乐中腐化,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点燃了史称“安史之乱”的战火,烧遍长安、洛阳两京,让盛唐成为长留世人心中的追忆。来到唐朝的遣唐使看到他们崇仰的文明之花在枯萎,在名山巡礼求法的学问僧遭遇“武宗灭佛”的风霜雨雪,这些消息都传回日本。这时候的日本贵族阶层也在翻版唐文明中得到享受,失去了付出牺牲西渡的勇气,听说唐朝衰落,更失去追求新知的动力,大家都尽量推诿不去唐朝,最后,由颇负文名的菅原道真出来提议废止遣唐使,得到贵族的响应,东亚世界影响至深、感人至极的遣唐使落下了帷幕。

## 遣唐使与日本的汉字教育

王献玲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 一、汉字教育在日本的全面推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是东亚文化扩散源地。自秦汉始,汉字便通过移民、官方交往、典籍流播等形式不断传入东瀛。中国历史发展到唐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引起日本朝野无比叹羨。为了全面吸收汉文化,搬演中华盛世,这一时期日本派遣遣唐使

赴唐学习,制定学令,不遗余力推广汉字教育。

#### (一)强化汉字读音教育

汉字教育首先由字音、字形去认字,进而研读汉文,达到精熟后才讲义。所以,进行汉字教育,首先是要学好汉音。对此日本学制里有详细规定,如702年制定的《大宝律令》其“学令”条明确指出:“凡学生